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第 2 期

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编制

2020 年 10 月 12 日

【观点摘编】

编者按：五年规划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从1953年至今，在13个五年规划（计划）指导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开门问策，谋篇布局“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很多未来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都要在这五年破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第一，应该如何依托双循环战略实现内涵型增长？第二，如何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中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

【破题“十四五”】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

一、双循环的提出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内涵型增长正当其时。今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日益加剧，加之突发的新冠疫情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百年一见的疫情深刻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预期，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重塑。从生产的价值链分布角度来看，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逐步嵌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我国已经跃迁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另一

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风险也日益暴露，国内某些产业的低端锁定效应也越发突出，某些区域的发展存在日益萎缩的窘境，同时技术创新的“卡脖子”现象愈加明显。因此，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的产业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二、双循环的战略内涵与实现机制

党中央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综合判断而形成的最新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通过“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逐步与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形成了良好互动，通过知识溢出实现了经济系统的逐步跃迁与动态升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就业，搞活了市场，产业体系逐步完善，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增长阶段。但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供给侧改革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而内需的持续扩大成为战略基点，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

双循环的核心是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产业链的核心是资本化，创新链的核心是商业化，两者融合的前提是市场化，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重点是价值链动态升级。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越加迅猛。虽然某些国家采取了逆全球化的一些措施，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仍然难以逆转。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比较优势之一，目前正是我国完善价值链并提升产业链的最佳时机。如果把国内市场比作血液循环系统的话，全球市场正如呼吸系统所需要的空气一样重要。双循环的两大维度对于构建健康的经济系统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新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索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平台，做大做强企业主体，提升产学研协同水平，利用功能性产业政策培育有能企业。具有动态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角色，也是建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力的内循环体系的基础。

双循环的关键是重塑国内区域市场。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需求端需要再平衡，而供给端亟需再整合。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市场厚度，拓展区域市场深度，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我国幅员辽阔，产业门类齐全，构建统一大市场不仅有规模优势，还有市场纵深的潜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已经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学习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是实现经济追赶和产业

升级的重要保障。因此，持续推动创新要素整合、大力开展开放式创新仍然十分关键。依托国际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打造更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实现双循环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

三、双循环促进内涵型增长的创新路径

随着疫情影响的不断扩大，国际间贸易流、资金流、服务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受限，全球创新链和价值链循环受阻，断链风险不断加剧，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明显放缓，国际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已经深刻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某些产业甚至开始引领世界潮流。当然，绝大多数产业还是急需提升附加值，做好进一步的升级内功。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正在重构，中间品贸易比重上升，服务贸易比重也在加速提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呈现多链条交织状态。对我国而言，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迫在眉睫。那么如何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做好补短板呢？

首先，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内循环顺利实施的前提是不断提升居民收入，要坚持以民为本，民富为基，惟如此经济才可持续和畅通。为此需要把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抓手，不仅要从整体上扩大要素市场配置，加快要素市场发展，还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分类施策。我国各区域行政壁垒的客观存在阻碍了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带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制约了资源最大效益的发挥以及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布局和协同发展。同时，要素市场建设也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健全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运行机制，并完善政府监管水平，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应加快推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统一市场建设，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打破区域分割，减少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加强区域间和区域内合作机制建设，基于城乡一体化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通过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人才和创新等各类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交易成本。

其次，主动完善产业链并提升价值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中，中国已经成为链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节点，居于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网路的枢纽地位。据统计，制造中间产品的全球贸易中约有20%来自中国，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从消费

品扩展到资本品，中国的电子电气设备、高科技零部件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同时，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进口份额都非常高，表明该产业已经深刻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网络。另外，中国对能源、金属、木材等上游原材料的进口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应高度重视海外能源与矿场资源，加快战略性资源的安全性布局，打造一流竞争力跨国资源企业，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当前的疫情危机正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并打通我国创新链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大力提升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战略窗口期。随着防疫常态化措施的推行，采用数字经济助力防控、大力推行非接触式物流和网上云端服务正逢其时。疫情期间传输软件服务数字产业链条蓬勃发展，有效支撑了区域经济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应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为疫情后世界经济重启做好充分准备。应鼓励企业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提升交易效率，精准匹配供需信息，促进经济信息联动共享，提升资源配置水平。

再次，要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新发展格局决不是简单的国内封闭循环，而是高水平开放基础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从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市场到高等要素融合的动态升级。根据新的经济战略，要从之前的商品贸易流动型开放走向共融规则认同基础上的制度型开放；重新梳理区域比较优势，依托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城市群，从简单数量型单项外资引进向内涵型双向投资转变，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有条件本土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与收购国外企业，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工业园区与科技合作示范区，培育中国的本土扎根型跨国公司并实现全球化运营。同时，激励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依托国内价值链和超大规模市场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站在内地开放型经济高地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以国际化合作视角来解决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能过剩与技术封锁问题。积极推进“海外中国”建设，促进我国跨国型企业对东道国本地化创新资源的吸收与利用，大力促进逆向知识溢出，并逐步提升国际创新链治理水平，探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本文作者系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孙华平教授，本文摘编自《**依托双循环实现内涵型增长**》，该文发表于《光明网》-理论频道）

编者按：双循环的实施需要经济系统各主体间内外协同，尤其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及有能企业共同发力。作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依托，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战略是重要的措施抓手。那么，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协同发展状态如何？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如何做到内防污染产业集聚、外防污染产业转移进而实现绿色发展呢？

环境规制、FDI 集聚与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研究背景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以绿色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增长，以约20%的国土面积支撑着近45%的经济总量和40%以上的人口，但快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背后水资源消耗与水环境污染凸显。2017年，长江流域515个评价水源地全年水质合格率仅为73.2%，全年期水质劣于III类水河长已占到16.1%，虽略好于中国三河三湖等流域（淮河、海河、辽河与太湖、巢湖、滇池），但仍面临着严峻的水资源与水环境危机。“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依然严重，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长江经济带废水排放总量占全国的40%以上，水环境问题根本在于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与水污染排放的经济集聚，长江经济带水污染治理与用水效率的提升道阻且长。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或伴随着水污染避难，2017年《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提出，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和以内需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有序转移。因资源环境压力及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一些高耗水高排放产业选择逆江而上跨域转移，需借助环境规制理念与手段规范各用水主体的行为，而提高用水效率与降低非合意产出也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某地区水环境治理投入也会因相邻地区污染外溢很难见效，中国特殊的政治与财税体系也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力合作，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集聚也存在“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两种假说，应该从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府际竞争与空间溢出角度考察经济带省际用水效率的空间分异。

二、主要结论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经济带在产业集聚与人口聚集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要坚持绿色发展与生态优先，控制水资源利用过

程中的水资源耗费总量与强度、废水排放总量等，最终提升用水效率。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1省市作为研究区域，以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与用水总量作为投入指标，以GDP与废水排放量分别作为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采用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E-SBM模型对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用水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考察用水效率、环境规制、FDI集聚、二者交叉项的空间相关，并采用空间与时间双固定的SDM模型，检验省际用水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用水效率测度结果显示，从发展趋势来看，研究期限内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但中西部一些省份用水效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从省际差异来看，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呈现东西中部各省市阶梯下降，尤其是上海与重庆作为直辖市用水效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变异系数来看，长江经济带整体上呈现先趋同后不断扩大的趋势，仅有中部省份用水效率呈现不断趋同的趋势。从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来看，虽用水效率仅在部分年份呈现空间相关性，但用水效率与环境规制、用水效率与FDI集聚在大多数年份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本区域用水效率的影响作用来看，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工业化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城镇化、技术创新、地区发展水平存在显著负效应；从对邻近区域用水效率的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城镇化、工业化、外贸依存度正向溢出显著，技术创新负向溢出效应显著。

为提升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用水效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①选取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与政策工具，加强环境规制的执行力与监督考核，避免各地差别化的环境规制与执行标准导致的污染产业区域转移；②制定科学合理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政策，引导外资进入绿色环保或高技术产业，严格限制高耗水高排放外资企业，充分吸收与借鉴外资企业的先进节能减排技术；③引导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转型升级，减少不切实际的盲目城镇化与规模扩张，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与低端制造业，构建经济带现代化产业体系；④加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贯彻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与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创新基地，重点加强对节水减排技术改造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与转化应用，加强经济带各省市的技术联盟与技术共享；⑤建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及水环境治理的协同机制，引导长江经济带合理安排产业布局，严格限制各省区逐底竞争与以邻为壑，对于水资源与水污染问题构建联动解决与合理补偿机制，规范经济带产业梯度转移。

（第一作者系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丁绪辉副教授，该论文成稿与发表时为河海大学博士后，本文部分摘自《环境规制、FDI集聚与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

究》，自科基金委管理学指定重要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8期)

【会议速递】

“2020年中国创新学术网络博士学习班”顺利召开

当前，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正采取一系列产业政策措施，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诸如物联网、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增添新动力。基于此背景，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组织召开2020年中国创新学术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创新战略国际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来自韩国首尔大学、日本国家政策研究院、西班牙创新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印度那纳克开发大学、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内外创新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围绕新技术和后来者赶超、下一代技术的趋势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颠覆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创新系统、技术发展与全球化等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会议共分为两个部分——博士学习班（ACADEMY）和国际学术研讨会（WORKSHOP）。其中，博士学习班（ACADEMY）于24-28日举办，主要包括国内外专家授课和博士生论文汇报与点评等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WORKSHOP）于29-30日举办，主要包括国内外专家报告和相关论文的汇报与讨论等活动。

8月24日，博士学习班在钉钉云端和线下会场正式召开。首先，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郁培丽教授作为会议组织者致开幕词，对参与本次会议的各位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浙江大学金珺教授对GLOBELICS和CICALICS相关背景进行了介绍，并表示GLOBELICS是一个基于学习、创新和能力建设系统的学术团体，在全球创新学术领域极具影响力。自2002年11月成立以来，该学术团体一直致力于推动南北、南南的合作与交互学习，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高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和发展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质量。而CICALICS作为其下属区域机构，是连接国内外创新学者和专家的重要学术平台，有助于提供高起点、深层次最前沿的学术学习和交流机会。

开幕式结束后，日本国家政策研究院Patarapong Intarakumnerd教授正式开始授课，针对“发达国家公共研究机构在支持产业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分享。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就发展中国家产学研联系的解释模型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并得到了Patarapong Intarakumnerd教授的细致解答。

浙江大学黄灿教授以“我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首先，黄灿教授重点介绍了不同知识产权类型，并以Coca-Cola, Apple iPad touch, Harry Potter等案例进行深入讲解；然后，黄灿教授阐述了中国初期的知识产权制度，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申请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这与政府的补贴密切相关；进一步，黄灿教授分析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强调了第四修正案草案的要点内容；最后，黄灿教授分享了他对中国四方专利家族和跨国公司专利行为等情况的研究，同时介绍了如何进行专利数据的查询。

博士学习班的两组学员就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两篇研究文章与黄灿教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其中，以复旦大学博士生刘庆全为组长的小组主要提问了创新动机、用于中国指导技术产业发展的专利法、当地企业在知识产权较弱的情况下如何实施研发等方面的问题。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刘晨蕊为组长的小组总结了两篇文章值得借鉴的方面和有待完善的方面，同时针对知识溢出、变量选取、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等内容进行了提问。黄灿教授依次耐心解答，各位与会学者收获颇丰。西安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尚晏莹以“数据驱动下的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发展路径”为题进行了论文汇报。随后，黄灿教授、东北大学张昊教授和东北大学博士生刘沐洋分别给出了相应的点评意见，主要涉及顾客服务化概念、商业模式和动态能力维度划分依据、动态能力案例分析、论文模型简化、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案例分析与研究结论间的逻辑连贯性等方面的内容。

江苏大学孙华平教授、石俊国副教授以及留学博士生Adjei等全程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

（本栏目由石俊国整理）

【实践方案】

与“非典”时期相比，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之际，我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都极大地考验着我

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与应急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未来投资者的信心和投资决策。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依托是多年来在市场化改革中涌现出的制造业集群与块状经济优势，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分工细密、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协同效应。目前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部分资源短缺，必定会导致物价上升，进而影响我国的低成本供应链优势。同时由于我国企业的创新惰性以及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过度依赖，因此参与价值链环节中创造的价值量相对比较低，某些行业的确存在着断链风险。目前，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已面临破产和裁员压力，跨国投资企业减少了在华尤其是在武汉的员工数量，例如2020年1月25日，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宣布将撤离38名员工，拉开了跨国车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帷幕。随后，在武汉及周边设有工厂的数家汽车合资企业，如东风本田、东风雷诺、上汽通用等都采取了将外籍员工撤出武汉的举措。汽车产业拥有紧密的产业链，外资车企减少在华经营活动势必会加大我国汽车产业陷入断链的风险。

疫情导致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断链风险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一是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经营的不稳定，一些制造业的嵌入地位不保，面临订单业务上的减少，从而对其供应链运营出现连锁反应；二是面对目前我国内需不旺的背景，制造业如果面临断链，实体型制造企业何去何从是个大问题；三是全球价值链断链必定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可能带来较大的失业潮，进而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四是影响我国企业向全球市场迈进的步伐，一些外国供应商一旦找到了新的价值链替代就很难再回头，这又势必会影响中国的全球产业影响力；五是全球价值链断链势必会降低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从而会影响我国的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结构升级。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借助于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辅以足够灵活的政策工具，那么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同时可以把全球价值链的断链风险控制在较低的区间水平。

当前确有全球供应链及制造业价值链的“断链”隐忧，但系统地看，也蕴含相应的转型升级机遇，危机中往往也蕴含着转机，疫情可能会带来一些变革机会。一家叫做“稳健医疗”的企业，早在2019年12月20日，就通过大数据预估到了疫情的来临，紧急召开了企业管理层会议，动员旗下公司提前一个月加紧集中生产了1.09亿口罩。同时我国工业体系完善，产业链成熟度高，而海外客户重构供应链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成本，且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在基础设施、劳动力数量、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虽然疫情会影响到中国部分企业零部件和中间品的生产进而带来断链的风险，但这也会促使中国提高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而且通常在疫情结束之后，国家的生产和进出口贸易都会出现反弹的趋势。同时，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被抑制，但之后必将大幅反弹。经济走向很大程度上受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民众情绪影响，在疫情压力下，要引导投资者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此外，应该提高转岗培训和赋能力度，关注开工率和就业率这两个经济核心指标，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预期。各级政府要在目前已实施的管控措施上查漏补缺，尽快扼制疫情的全国性蔓延，有序推动无疫情区的企业及供应链复工生产，恢复正常秩序，力促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策略建议：

第一，提升中国产业链的抗压韧性，构建平衡发达的产业体系。政府在短期内应注重在对各区域进行精准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各项保障措施，推动各类企业错峰复产，实施精准复工复市。特别是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等疫情较为平稳、产业集群集中的重点地区，要分级分类推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帮助企业寻找配套厂商和跨地协作，形成区域内小循环和区域外大循环相衔接的产业链联动格局，切实提高企业复工复产质量，并做好应对复工复产过程中个别突发性疫情的各项准备。随着疫情在境外的扩散与蔓延，我国要进一步加强入境检疫，对于重点地区的入境旅客，采取有力的管控措施，严防境外疫情的输入。同时做好应对部分产业海外供应链断供的可能，在意大利等地区，已经有诸如MTA这样的汽车电气系统零部件关键供应商受疫情影响而停工。中长期看，在对疫情进行科学防控的同时，应该制定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比如降低准备金率、逆回购及减免税收等来应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为疫情过后更好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做好准备。为此应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分级施策、有序复市，激发中国强大的内需应成为重要着力点，构建统一大市场势在必行。就疫情过后的长期经济恢复而言，工业经济韧性一般低于服务业和农业（周侃等，2019）。疫情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也大于服务业和农业。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工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国家可以考虑对制造业实体经济实行低息贷款，齐心协力帮助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价值链上核心企业度过经济难关。而对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而言，无疑正是扩能的战略机会。另外，从全球价值链协同的角度看，应进一步鼓励集群式制造型企业向“研发设计”与“销售自有品牌”两端攀升。

第二，提高企业经营灵活性，重构供应链危机的应对体系。疫情对于制造业企业的短期冲击不可避免，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减少管理支出、简化企业内部流程、优化业务范围等方式，采取各种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现金流。在复工之后，要加强对于员工的健康监测和园区封闭管理，企业可以通过适当加快生产进度，采取人员轮休、机器设备不停的方式加快恢复供应能力。长期来看，要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并在供应链规划与管理上提升韧性。此次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劳动力短缺对于企业生产的影响，今后我国制造业企业应进一步推动智能化车间、智能化工厂改造和建设，提高智能制造水平，以更好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企业可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提升技术储备动能，要善于借助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抢抓创新研发高地，吸引创新人才，完善创新机制，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引导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供应链韧性，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加快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和供应工厂，与国内供应基地形成互补，通过产品对冲、市场对冲和客户对冲等方式来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提供自身供应能力的稳定性，增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

第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社会经济治理能力。疫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亟待破题。我国已进入新时代，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治理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动态巨系统，如何在这样的复杂系统中探索更为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民众的扩散性恐慌比疾病本身更为危险。研究表明，科学准确的信息传播也会减缓疫情的进展速度。因此首先因构建信息公开透明化机制，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尽早公开信息也有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状态并促进各方科学决策。要促进相关大数据平台协同对接，精确发布疫情与产业发展及进出口等信息。信息平台及时公开信息很重要，有利于企业精准获取最新信息。及时发布各类战略信息有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盲区状况，从而做出更科学优化的决策。另外，疫情的进展表明防疫不仅仅是卫生系统的事情，还涉及交通物流、安全外交和各类经济部门，因此长期看也要科学打造更为流畅的资源分配与应急供给机制。应对疫情的封锁隔离措施在短期内是较为有效的手段，然而如果大面积长时间持续中断经济生产，社会停摆的

压力难以疏解，物资供应难以持续，那么会产生巨大的系统风险。突发性公共卫生时间来临时，对医疗资源的拥堵型消费有可能导致更大的非理性恐慌，而紧急状态下的物资供应与资源分配往往面临着更为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该根据疫情事件的阶段性特征动态调整治理策略，尤其是核心疫区以外区域应尽快调整产业治理策略，以免发生次生灾害。

第四，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互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但也成为我国发展新兴产业和智慧物流模式的转型契机，尤其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机遇。疫情进一步催化“宅经济”勃兴，正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好时机。“宅经济”进一步提升电商渗透率，并催化线上新兴业态发展。艾媒研究数据表明：2020年春节，国内有超过1800万家企业采用线上办公、开会、交流等，应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参与员工数超过3亿人。当前，中国已经发展为当今世界上的电子商务大国，各种类型的电商平台风起云涌，发展迅猛。要积极刺激国内需求，活跃国内市场，在疫情背景下鼓励民众网上消费，扩大内需是刺激经济的强有力的措施，使得我国企业即使面临断链风险也能自保。应鼓励物流企业提升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力推广“无人服务”商务模式，积极推广智慧物流系统，鼓励物流企业采用无人机等自动化手段开展物流服务。因为由于此次疫情需要采取严格的隔离手段，对电商和物流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无接触送货，避免交叉感染，成为了传统物流行业变革的重要方向和趋势。与此同时，企业延迟复工，不得不催生出线上办公系统；学校延期开学，又推动了线上教育的兴起，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了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变革。应加快“机器换人”和“智能制造”步伐，继续鼓励企业实施灵活就业方式，转变思路让员工在家进行网络上班的方式尽量规避风险，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动态升级，不断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加大海外投资力度，推进“海外中国”建设。从多元边际的角度看，出口或投资过于集中于某些国别市场是具有风险的。因此需要推行市场开拓战略，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另外，在中国复工相对迟缓的情况下，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要积极和国外合作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协调，提升我国国际软实力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增加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另外，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契机，打造中国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建设2.0版。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正面临战略升级的大好时机。因此要扩大国外的生产制造能力，并学习借鉴日本当年的雁阵模式，再造一个“海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我国制造业实现“海外中国”的重要基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融合程度和关联地位呈增长态势，我国应该大力增加对该区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姚星等，2019）。然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发展与融合水平存在极为明显的不平衡问题，因此应该采用有针对性的“一域一策”，比如可多鼓励企业在巴基斯坦、蒙古等我国周边友好区域加大海外投资，同时我国也有不少企业前期已经在这些区域布局了产业园区并渐成规模。对于东南亚地区，可以推进我国产能尽快实施区位转移，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对于日韩近邻，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区谈判，打造中日韩经济圈，促进区内直接投资。对于中亚和西亚地区，可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尤其是推进电力和环保等设施建设。但是鉴于伊朗等国的疫情状况也已较为严重，因此短期内可以加大对于非洲地区的投资作为替代，尤其应把中国的产能转移与其当地的工业化进程有机结合，在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筑牢中非友谊的坚实物质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疫情背景下增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韧性，不仅需要借助超大市场规模进一步深化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水平，也要平衡好区域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动态关系，打造基于都市经济圈的区域产业有机融合体。同时，还应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围绕实体制造业集群打造优质高效的区域服务体系，提升外向型企业与国内企业间的协同度，降低各类制度成本，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创新型技术与知识在部门间的溢出。

（本文第一作者系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孙华平教授，本文摘编自《**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及断链风险**》，该文发表于国家财政部主管杂志《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